

土地革命时期农民与中共的互动关系研究

张宇杰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浙江 杭州 311100

摘要: 土地革命时期, 中共逐渐走出了工人阶级中心论和对国民党的幻想, 认识到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力量, 企图以土地政策、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团结农民开展革命运动, 在这过程中农民逐渐成为中共党内的主体力量, 从而拓宽了党内基础, 也推动了中共的组织体系由城市向农村深入发展。这种农民与中共之间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 揭示出这一时期党的发展建设的特征, 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发展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土地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 农民

A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asant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Land Revolution

Zhang Yuji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Zhejiang Hangzhou 311100

Abstract: During the Land Revolution perio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radually moved away from the worker-centric theory and illusions about the Kuomintang, recogniz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peasants in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The CCP attempted to unite peasants to carry out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through land policies,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is process, peasants gradually became the main force within the CCP, thereby broadening the party's internal base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CP's organizational system from urban to rural areas. This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asants and the CCP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ty's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during this period and provides lessons for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Land revolution perio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easants

0 引言

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发展中的重大议题。本文以认识论、方法论和互动论的三种视角, 探讨土地革命时期农民与中共之间的互动关系, 以期揭示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农村的践行, 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1 认识论的视角: 农民成为中共开展革命的重要力量

20 世纪前的中国社会长期是一个封建化的农业社会, 农民阶级的广泛性、封建体制的剥削性和地主阶级的压迫性使得农民的革命性具有深刻而充分的现实根源。然而, 中共对于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认识并非一蹴而就的: 在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分析中, 农民的地位逐步提高, 中共对于农民问题的认识也逐步深入。

1.1 早期的工人阶级中心论与农民问题的认知局限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 受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俄国

革命的经验影响, 党的领导人主要关注的是城市工人阶级, 认为工人作为无产阶级具有“特别能战斗”的大无畏的革命品质, 是革命的主要力量, 而农民作为“半无产阶级”(陈独秀首次提出)有着种种缺陷: “中国的农民阶级虽然人口上占多数, 但三种因素决定了农民难以加入革命: 一是农民居住比较分散, 散漫不集中, 难以发动革命; 二是农民思想文化落后保守, 封建宗法思想牢固, 革命的愿望“不脱神权帝王迷信”, 很难接受社会主义革命; 三是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 中农的阶级利益与共产主义革命是根本冲突, 即使是贫农反对地主运动也只囿于转移地主的私有权为己所有”, 可见当时对于农民阶级的认识, 党内还存在“论出身”的机械宿命论观点。因此, 此时中共的诸多策略多侧重于依靠城市工人, 通过工人运动推动革命。然而, 很快党开始意识到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与俄国有很大不同: 当时的中国, 尤其是农村, 经济相对落后, 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 而工人阶级相对较弱还无法完全肩负起实现社会革命的重任——如何寻找革命的同盟军成为

开展革命的“首要问题”。

1.2 国民党反革命性的暴露与农民革命性的发现

关于革命同盟军的问题，早期中共党内存在诸多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与以代表资产阶级力量的国民党开展合作，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坚持工人革命，以毛泽东、李立三等人则认为农民是革命的重要同盟军。然而，随着 1927 年国民党政权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大规模的打压以及此后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暴动的失败，尤其是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前两种错误的思想受到深刻的现实挫败，“有许多同志，有一种轻视农民运动的倾向，以为这是中国几百年来便有的不断的农民暴动，这就说这些农民暴动不是新的东西，对于整个的革命运动没有甚么大的关系”，然而“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太弱，如果不能取得广大的农民群众，那么革命是没有成功的可能”，党中央开始逐渐认识到农民是革命的重要力量，党中央的重要领导人如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等人也在实际工作中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同一时期，毛泽东根据对农村农运的调查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充分认识到了农运潜在的革命力量，坚定了对于农村农民革命的信心，开始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综上，中共对农民重要性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最初对农民问题的认知局限，到在农运和调研中发现农民的革命性，最终确立了依靠工农斗争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这一认识的转变不仅是中共战略调整的结果，也是中国社会现实、阶级结构和革命需求的共同推动下形成的革命思维。这一转变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方法论的视角：中共领导农民开展革命运动

中共在认识到农民深刻的革命性后，通过动员和教育农民成功地将具有“分散性”的农民阶层团结起来，形成了强大的革命力量。通过明确的政策导向、广泛的群众动员、持续的教育培养，中共不仅解决了农民的物质需求，也增强了农民的政治认同，使得他们在土地革命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1 动员农民：激发革命斗志与广泛参与

土地是农民的根本诉求也成为激发革命斗志、强化政治认同的重要一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根据地内颁布和发展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土地法》等诸多土地法令，开展广泛的土地没收和土地

分配活动，以没收地主土地、将“地权农有”与重新或多次重分土地同时并举来获得农民的支持，缓解农民内部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分歧同时“动摇农民私有观念”。而如果说“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为农民提供了最直接的经济利益和激励，那么，宣传与群众动员大会则极大地传播革命理念和中共通过宣传活动，特别是通过农民大会、宣讲、游行等方式传播土地革命的政策和红色理念，“不仅明确、坚定、充分地告诉他们关于向敌人进攻的必要性、迫切性和敌人进攻对人民危害的严重性，又告诉他们红军的优良条件和必胜志愿及工作方向等”，号召他们为守护根据地、粉碎围剿而斗争。此外，阶级意识的激发也是中共能广泛动员的重要原因。在阶级固化的封建社会中，人生而不平等深深刻在农民心中，成为他们忍受剥削的根源，唯有打破这种观念，才能在真正推动革命浪潮的席卷。在“阶级斗争”的框架引导下，农民普遍认识到：“怪不得我们穷了，原来都是地主阶级剥削的，大家不团结起来打倒地主、恶霸，穷人一辈子也翻不了身”，由此就自然生发出通过革命暴动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要获得自己生存发展的权力的信念。这种对于社会不公与阶级对立的揭发，激发农民的革命情绪和参与斗争的决心。

2.2 教育农民：提高政治觉悟与革命意识

农民阶层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但是在传统宗法礼教的束缚之中，他们很难自发形成强大的对抗地主和资产阶级压迫的力量。在革命动员中，中共看到了以土地等物质利益的引导并不足以稳定农民的革命意志，消除传统文化理念对于革命的阻碍必须通过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和革命意识来实现，必须使他们认识到土地革命不仅仅是个人利益的追求，而是社会变革的一部分，从而自发自觉地开展革命斗争。为此，中共开展了显隐性结合的、各种内容丰富、群众喜闻乐见的政治思想教育活动如开设俱乐部、设立农民学校、开展政治讲座、组织农民读书班、开展具有启发意义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戏剧、歌舞）等，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政治素养，解决农民的政治困惑，以此塑造农民的政治认同，推动农民革命意识的形成。

3 互动论的视角：农民影响中共政党建设与发展

3.1 政党成员的组成：农民的参与拓宽党内基础

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农民不仅是革命的支持者和执行者，还逐渐成为中共政党成员的主要来源之一。特别是在农村，农民的加入为中共提供了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据数据显示,1927年4月中共五大时,党员总数为57967人,其中工人占50.8%,农民占18.7%。1928年6月中共六大时,全国党员总数为四万多人,其中农民占76.6%,工人只占10.9%。“党的工人成分减少,农民数量超过工人同志7倍”。井冈山时期,边界各县的基层党组织里,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员。1931年3月31日,刘少奇在共产国际发言时指出,全国党员为二十万人,“党的成分多半是农民”。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全国党员有三十万人左右,90%在苏区,农民党员约占80%。又据1934年中共党员成分统计,农民占87%,工人占5.8%。这一过程改变了中共原本较为精英化的成员构成,使其从早期的工人和城市知识分子主导的政党,逐步转向了一个更加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政党。农民的加入和参与,增强了党内的阶层多样性,使得中共能够更加贴近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愿望。

同时,农民的阶级特征也对党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农民作为广大劳动人民的代表,其加入使得中共的成员构成具有了鲜明的阶级特征——农民阶级在党的组成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吸纳农民的过程中,中共的政治取向逐步偏向于农民阶级的利益,制定的政策也更加侧重于农村问题如土地改革、农村经济等。这种转变促使中共形成了一个以农民为基础的党的群众路线,促使党更加注重民生问题,确保了党能够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和参与。其中,农民党员不仅在党的基础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也逐渐进入了党内的决策层。这种从基层到高层的参与促进了党内民主和制度建设的完善,农民的实践经验、革命理念对党的方针政策和组织形式的构建起到了推动作用。

3.2 组织体系的建设:从城市向农村的深度渗透

由于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主导地位,中共意识到必须加强农村地区的党组织建设。在早期的革命中,党的组织体系主要集中在城市,但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党逐渐将组织重点转移到农村。中共在农村建立了众多的地方党组织,通过党支部、乡镇支部等形式,形成了完整的基层组织网络。这些党组织“对农民的组织渗透和农民参与政治空间的空前加大,使中共得到了农民的普遍了解与支持;农村建立各级宣传组织系统,一些省份甚至在乡级机构也设立了宣传干事,中央苏区大部分乡村都建立了宣传队组织”,它们不仅负责发动和组织农民进行革命斗争,还通过党组织的力量,推动土地改革政策的实施,确保农民的积极参与。

此外,在与农民的互动过程中,中共不断调整其政策

执行方式,尤其是在土地改革的实施过程中,党始终坚持根据农民的需求和实际情况调整具体政策。例如,党加强了对土地分配的监督,确保其公平性和公正性,同时加强了对农民群众的教育和引导,避免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农民不满和抗议。通过这种灵活的组织管理,中共不仅保障了革命的顺利进行,也增强了农民对党的信任和支持。

4 结语

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发展中的重大议题。无产阶级的政党如何在无产阶级力量弱小而农民群体庞大的国家实现革命的成功?从认识论、方法论和互动论的视角出发,土地革命时期农民与中共的互动关系分别探讨了中共如何在实际调研和革命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农民的认识、如何在领导农民开展革命斗争中完善策略以及如何在农民群体的参与中开展自我建设、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科学性的问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一时期发展历程,展现了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实事求是、自我革新的伟大革命精神,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发展提供了可能的借鉴。

参考文献:

- [1] 左雯敏. 农村阶级与农民革命——以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为中心的分析[J]. 思想战线, 2022, 48(01): 118-128.
- [2] 黄亚楠. 20世纪30年代前后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认识与实践[J]. 毛泽东研究, 2022, (05): 61-70.
- [3] 刘红凇. 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逻辑与革命时期的实践经验[J]. 江西社会科学, 2021, 41(05): 5-16.
- [4] 崔禄春.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21, (05): 18-22.
- [5] 王增祺, 钱均鹏.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实现形式的成功探索[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21, 14(01): 24-31.
- [6] 刘珊珊. 李立三对中国革命中农民运动问题的认知[J]. 东岳论丛, 2018, 39(05): 22-30.
- [7] 吴晓荣.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土地革命纲领的确立[J]. 江西社会科学, 2018, 38(07): 137-145.
- [8] 方圆, 彭继红. 从土地问题看农民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选择[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 47(03): 119-125.
- [9] 刘歆立. 毛泽东的农民权利思想及其实现道路的革命探索[J]. 现代哲学, 2017, (03): 65-70.
- [10] 简奕. 试论中共早期农民运动对民团的争取与改造——四川早期党团组织改造民团的历史考察[J]. 中共党史

研究, 2017, (01): 109-119.

[11] 何志明. 一九二七年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研究——兼论土地革命初期中共党内对于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J]. 中共党史研究, 2017, (03): 50-59.

[12] 秦在东, 罗静.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革命觉悟养成途径探微[J]. 理论月刊, 2016, (04): 72-78.

[13] 胡芳. 毛泽东关于农民主张人民民主主义的探索——兼论对“农民主张东方文化主义”的批评[J]. 贵州社会科学, 2016, (11): 37-43.

[14] 吕满文. 土地革命时期红色军校在红军建设中的作用[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2(05): 113-118.

[15] 黄正林, 温艳. 民团、农民武装与陕甘边红军的建立及影响[J]. 中共党史研究, 2014, (05): 74-84.

[16] 张学凤.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考察[J]. 中共党史研究, 2011, (12): 25-33.

[17] 温锐, 杨丽琼. 中央苏区平分土地政策与农民权益保障的再认识[J]. 中共党史研究, 2010, (05): 64-70.

[18] 王永玺, 张晓明. 从《古田会议决议》看中国工人阶级在人民军队早期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王永玺[J].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10, 24(01): 74-76.

作者简介: 张宇杰(2001-), 男, 汉族, 浙江绍兴人, 单位: 杭州师范大学, 学历: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学科教学(思政)。